

长沙市建国三十周年文学创作选

散文特写集

(1949—1979)



长沙市文化馆编

一九七九年九月

长沙市建国三十周年文学创作选集

散文特写

目 录

唤起工农千百万

(回忆毛主席领导泥木工人开展罢工斗争)

.....长沙市老泥木工集体回忆(1)

红军进长沙.....吴自立(15)

在毛主席和杨开慧同志身边的日子里.....陈玉英(26)

板仓红霞

——记杨开慧烈士.....黄林石(44)

英雄长沙春常在.....谢作孚(58)

陶城散记.....赵德光(63)

农会哨.....周全胜(72)

大雁飞过的地方.....雷存国 耘 野(79)

湘江星路.....陈喜文(89)

海南育种散记.....章资超(97)

院子.....张新奇(109)

梧桐树下.....龙晓梅 (116)

“钢筋王”.....寇 丹 (121)

桔林的早晨.....陈若海 (132)

向阳花.....易允武 (135)

“八·一”起义纪念馆三记.....王 俞 (144)

未曾相识胜亲人.....周江南 王成宗 (148)

在革命大家庭里.....汤正华 陈 德 (157)

唤起工农千百万

——回忆毛主席领导泥木工人 开展罢工斗争

长沙市老泥木工人集体回忆

一九二二年秋，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长沙城六千多泥木工人组织起来了，摧毁了鲁班庙的封建行会组织，赶跑了封建把头总管值年，成立了工人自己的组织——泥木工会，举行著名的泥木工人大罢工，与反动当局进行二十天英勇的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五十五年漫长的岁月过去了。当年毛主席领导泥木工人开展罢工斗争的光辉形象，仍然历历在目，他老人家的亲切教导仍在耳边回响。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黑夜见明灯

二十世纪初叶，灾难深重的祖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反动军阀的血腥统治下，黑暗到了极

点。工人阶级遭受着野蛮的压迫和残酷剥削。长沙六千多泥木工人，更是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反动官府的“义务公差”、“厘头税”，封建行会的“红名香钱”、“入会费”、……多得不可胜数。那时候，我们辛辛苦苦干一天活，只挣得四十二个烂铜板，上不足以奉父母，下不足以养儿女，哪里还有钱去缴纳这个捐，那个税啊！一九一九年，曾为工价问题，我们作过罢工斗争，结果遭到张敬尧的镇压，限制我们工价“永不再有增加”。怎么办呢？只好拼着一条命，白天帮人家砌房屋，晚上又去拖板车，卖河水，来缴纳那些阎王债。有的工友劳累成残废，有的病死于街头，而物价天天涨，房租月月加，反动统治者对工人的压榨剥削，一天比一天厉害。

我们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去找泥木业的行会组织——鲁班庙的总管值年郭寿松、甘子宪，要求他们出面向官府商团交涉，调整工价。谁知这两个吸血鬼，事情没办，先伸出黑手逼着我们每人出五角钱的交涉费。将近三千元的银洋骗到手后，他们成天出入在“洞庭春”、“裕湘阁”、“曲园”等茶楼酒馆，哪把工人的事放在心上啊！一天、两天，一月、两月过去了，银洋全部被他们吞光了，可是交涉的事，却如石沉大海。

有一天，我们几个泥木工友坐在鲁班庙的戏台下等候郭寿松、甘子宪的消息，等了大半天，连一个人影也不见，大家十分气恼。正在这时，木工任树德提着一把斧子匆匆跑来了。任树德，为人厚道，做事有主见，热心帮助穷苦弟兄解决危难，在泥木工人中有一定的威信。他见我们坐在那里等候交涉消息，忙说道：“弟兄们，坐等消息是白费时间啊！”

十几岁的舒玉林回答道：“难道三千光洋就白白地送给郭寿松、甘子宪这班家伙不成？”

“莫说三千，就是三万，也难塞满他们的血盆大口啊！”任树德说到这里见大家还有点半信半疑，接着又说：

“大家想想，总管值年和那些当官的、穿长袍马褂的同一个鼻孔出气，都是吸我们的血、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坏蛋，怎么能指望他们来替我们办事呢？”经他一语道破了事实的真象，大家又后悔，又气恼。

“哼！这帮吸血鬼欺骗我们，老子要跟他去拚个你死我活！”舒玉林气得两个拳头捏得唧咕唧咕地叫。

任树德抓住舒玉林的拳头微微一笑：“你这只拳头能有多大力量！打死一个郭总管，还有甘总管，打死了甘总管，还有熊总管、周总管……”

“那……难道我们就伸着颈让人家砍呀！”舒玉林仍不大服气。

任树德扫视四周然后对大家说：“弟兄们，不要急！毛润芝先生帮我们想了一个好办法！”提到毛润芝先生，大家那惊喜的眼光直射在任树德身上。

“毛润芝先生是什么人？”

“是不是那个创办工人夜校的教员？”

“对！就是他。他是我们泥木工人的朋友，不，是所有工人弟兄的朋友。有了他，工人的事就有办法了。”任树德说到这里把声音放大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胜利，就是毛润芝先生想的办法啊！”

“好啊！”人们的心一下子开朗了，好象在那茫茫黑夜里看到了指路明灯，大家精神立即振奋起来。有人问：这位

毛先生住在哪里？”有的要任树德讲：“你是怎样认识毛先生的？”任树德不慌不忙把情况一一告诉了大家。

一九二一年七月，毛主席在上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回到湖南便建立了湘区党委，为了培养干部，又创办了自修大学。那时候，任树德常在那里给学校修理房屋家具。毛主席经常来到木工房和任树德亲切谈心，细心了解工人疾苦与要求，给他讲述革命道理，启发他的阶级觉悟，使他很快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长沙泥木工人中最早的一个共产党员。任树德告诉大家：毛先生知道了泥木工人的行动，非常关心。特地要他来鲁班庙和工友们商量。“毛先生讲什么？”大家一齐问道。任树德说：“毛先生讲：工人只有自己提高觉悟，组织坚固的团体，努力奋斗，才可能使生活改善，地位提高，除此以外，没有第二个法子。”

“对！”杨福涛连连称是：“人多力量大，柴多火焰高，组织起来跟他们斗！”在坐的也都觉得这个办法好。但也有顾虑，六千多泥木工人分居在南北四门，怕人心难齐，一下联合不拢来。任树德忙对大家说：“不要紧，泥木两行的工人，心里早都架起了干柴，只要我们去点一把火，马上就会烧起来的。”并说：“根据泥木工人居住分散的特点，毛润芝先生要我们先组织‘十人团’，把全体泥木工人按十人一团组织起来，然后推翻封建行会鲁班庙，成立泥木工人自己的工会。”大伙一听高兴万分。都说毛先生说话做事，处处都想到我们工人心坎上了。于是在场的七、八个人，当即进行了分工。在组织发动期间，任树德又通知我们到“船山学社”先后听了毛主席的几次讲演，使我们逐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不到一个月工夫，大多数泥木工人都加入了

“十人团”。长沙泥木工会于一九二二年九月五日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

这一天，驻省湘乡中学，彩旗高挂，喜气洋洋，泥木工人的代表，一个个兴高采烈从四面八方涌进会场；各行各业的来宾代表，向大会纷纷表示祝贺；湘区党委的领导同志，受毛主席的委托，也前来参加了我们的大会，会上由任树德同志报告了筹备经过，宣读了毛主席亲自草拟的泥木工会章程。庄严地提出了“我们是生产者，是创造世界的主人，应该是世界的主宰”的雄壮口号，选出了任树德、杨福涛、朱有富、仇寿松、舒玉林等四十一人为委员，任树德任总务主任，工会秘书是毛主席派党的负责干部担任的。

一块由毛主席亲自命名的《长沙泥木业工会委员会》的红牌子，在宝南街鲁班庙门口高高悬挂起来，泥木工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组织，心里多么高兴啊！许多工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赶走吸血鬼

泥木工人成立了自己的工会，熊七矮子、郭寿松、甘子宪这伙封建行会把头，早已看在眼里，恨在心上，好象几只发了疯的狼狗，东溜西窜，阴谋进行反扑。

这一天，工会总务主任任树德忽然接到一张请帖，上面写着：“略备菲酌，小祭鲁班先师。”他想：既不是鲁班生日，又不是逢年过节，鲁班庙怎么办起筵席来了？其中一定有鬼。于是他找了仇寿松、舒玉林几个委员当即进行分析研究，认为祭鲁班是假，拆工会的台是真。为了打好酒席筵前

这一仗，任树德马上把情况向毛主席汇报请示；同时由组织委员仇寿松负责通告全体会员，中午十二点到鲁班庙门外集合。

赴宴的时间到了，任树德听取了毛主席的指示，匆匆从清水塘赶来，当他一跨进庙门，只见那五睦堂上早已团团围满四圆桌人。有各届值年，有伪县衙官吏，有街团绅士，还有四个穿黑衣的警察。

熊七矮子见任树德同志一到，立即站起来讲话：“各位来宾，我们泥木工人祖祖辈辈都是属于鲁班庙，这是众所周知的。如今由少数人，另行组织什么泥木工会，完全违背了泥木工人的传统制度，因此吁请各届值年，街团绅士将泥木工会予以取缔。”值年、绅士们连忙附和：“取缔取缔！”有的还准备起身去扯牌子，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熊七矮子得意洋洋地对任树德说：“老弟！看见了么？”

任树德从容不迫地站了起来说：“我们看得很清楚，鲁班庙的总管值年们，吸工人的血，榨工人的钱，不替工人办事。因此，工人就要求有一个自己的工会组织。”

“什么话？”

“六千泥木工人的话！”任树德这一尖锐有力的回答，气得熊七矮子、郭寿松从凳子上跳起来，直喊：“把工会的头子先捆起来！”

任树德敏锐的眼光向警察们一扫，忙说：“有警察先生在这里维持社会秩序，谁敢动手抓人？！”弄得正欲动手的警察们尴尬地直往后退。

熊七矮子见一计不成，又生二计，依仗他们在座的人数多，妄图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来搞垮我们的工会。当他正得意

地喊着：“取消工会，多数通过”的时候，谁知任树德走到庙门口向外把手一招，大声喝道：“你们看，到底谁是多数？”集合在宝南街几千泥木工人一齐涌进鲁班庙，这时熊七矮子一伙人，个个呆若木鸡，面面相觑，做声不得。

任树德大声地对工友们说：“五睦堂的总管值年，要取下工会牌子，你们说，同不同意呀！”工人们一听，气愤万分。

“谁要拆我们的台，叫他出来！”

“总管值年滚出鲁班庙，工人的事工人办！”

喊声象一阵阵的春雷，吓得总管值年不敢吭声。接着任树德同志又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要总管立即交出鲁班庙的“红名簿”（工人名册）和全部财产契约。这下好象要了总管值年们的命似的，推的推，嚷的嚷，要尽花招。熊七矮子装出一副死熊样子，哭丧着脸说：“工友们，这件事恐怕要与各届总管值年商量，我……”

“不行！一定要马上交出！”大家又一齐怒吼起来。在几千工人的强烈要求下，他们才不得被迫同意交出。

鲁班庙的封建总管制度，就在这酒席筵前垮台了。

罢工要胜利

泥木工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一面加紧发展“十人团”组织，一面向全城散发调整泥木工价的传单，扩大社会影响。为了取得各方面的声援，毛主席亲自与“中华总工会”及其所属工会俱乐部，以及“自治励进会”等取得联系。通过有组织的开展广泛活动，不少街团和学校，愿意接受泥木工人提出的要求。

可是，伪长沙县知事公署，妄图采取高压手段把泥木工人刚刚燃烧起来的火苗一举扑灭。全城张贴告示，说什么泥木工会调整工价，是“蔑视官厅定案，自由行动。”并勒令从即日起，恢复原来的工价。我们见到告示，愤怒的火光，立即从心里迸发出来。一个晚上，就把全城布告撕了个精光。

斗争进入了短兵相接的阶段。这时，毛主席又亲自来到鲁班庙东边花厅，帮助我们认真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周密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和我方力量，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宣布罢工了。毛主席这一把火，立刻在六千泥木工人的心头燃烧起来。当晚即由工会主要骨干组成了罢工委员会，研究了罢工的部署，制定了罢工的六项规定。

一九二二年十月六日，长沙泥木工人罢工的斗争序幕拉开了。全城所有建筑场地，见不到一个工人。正在施工的什么伪省长公署啦，伪第一师司令部啦，伪省衙“双十节”的牌楼啦，全都停工了。以舒玉林为首的几十名纠察队员，臂佩红袖章，颈围五彩线，打着“坚持罢工，请求各界援助”的横幅，在大街小巷巡逻，维持罢工秩序，打击坏人的破坏活动。城厢内外，到处是贴标语、散传单的工作，到处听见我们宣读罢工宣言的激昂声音：“我们苦力工人，一天的工作，硬是把一天的阳寿和精力来换几个钱去养家眷，并非坐食冤枉。试看他们商家，不上几天又把价码一涨，为什么又没有人反对呢？独于我们工人的整天汗力得来几个工钱，还要遭这种摧残。……我们别的权利虽然享不着，营业和工作的自由是应当享有的，而且这点我们誓死也决不受任何方面的剥夺……。”

泥木工人血泪的控诉，愤怒的吼声，传遍了全城，影响到全国各地。在长沙作工的湖北、江西、上海等省市的泥木工人也一道投入了罢工的行列。长沙市缝纫工人、织造工人、印刷工人、以及长辛店、粤汉铁路、安源路矿等工人的声援电报和信件，象雪片飞来，大大增强了我们的胜利信心和勇气。

罢工第五天后，有很多学校、机关、商店纷纷来信要求复工。罢工斗争越深入，承认调整工价的单位也越来越多。这时，有少数生活负担较重的工人，向罢工委员会提出，是否可到愿意调整工价的雇主处去做工。根据这一情况，任树德到清水塘请示毛主席，回来后，当即在罢工委员会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他说：“弟兄们，毛先生讲，承认调整工价只是这些房主急待修理房屋，而长沙县署并未收回成命、承认我们有营业和工作自由的权利。所以毛先生要我们克服困难，坚持到底，以期得到最后的胜利。对于那些家里已经揭不开锅盖的阶级弟兄，毛先生会帮我们很快解决困难的。”接着任树德同志又宣读了以毛主席为书记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给我们泥木工会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党对我们泥木工人亲切的教导、极大的关怀，它给我们进一步指明了革命方向，鼓舞着我们继续前进！因此我们当即要工会秘书用大红纸书写出来，张贴在显目的五睦堂上。

罢工坚持到十月十六日，长沙县署仍然没有收回成命。罢工委员会又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向长沙县知事周瀛干发出了通牒：“如十月十七日尚无解决希望，即将于十九日举行游行示威。”通牒发出后，周瀛干着慌了，于是软硬兼施，

一方面派出所谓“公正绅商”出面调停，要我们“谅解政府”，不要游行请愿。另一方面亲自抛出一篇《奉劝泥木工人》的公开信，在《大公报》上发表，说什么：“切莫听那些少数人的拨弄是非。……甚至被少数不良分子所利用，扰乱社会秩序，可能要遭到法律制裁。”妄图分裂工人队伍，瓦解革命斗志。熊七矮子、郭寿松这班家伙也配合着县署到处活动，对工人们进行恐吓威胁。罢工持续越久，斗争愈激烈，工人生活更艰苦，少数人产生了动摇情绪。

毛主席了解情况后，又及时在“船山学社”召开了罢工紧急动员会。会上，毛主席揭穿了周瀛干的种种花招和虚弱本质，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勉励大家坚持斗争，不为欺骗、恐吓所屈服。并说：“游行时，我们都来，外面援助的事有人专管，你们放心与周瀛干干到底。”

毛主席的指示，大大地鼓舞了工人们的斗志。

直捣阎王殿

十月二十三日清晨，乌云笼罩着的长沙城，露出了一线曙光。毛主席身着工人服，手执口哨，率领我们六千多泥木工人队伍，穿街过巷，举行游行示威。一路上旌旗招展，口号连天。队伍浩浩荡荡从教育会坪出发，经过贡院西街，绕过老照壁，向县衙门进发，忽然狂风呼啸，大雨滂沱，工人们淋得浑身透湿。当大家看到毛主席走在队伍前面，精神抖擞，步履矫健，个个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和勇气，继续迈开大步，紧紧跟随毛主席冒雨前进。

县署门口，刀枪林立，戒备森严，正门中间摆着一张桌

子，桌子上插着两张杀人“大令”。但是紧紧团结在毛主席身边的几千泥木工人是不怕杀、杀不绝的。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直开到县衙门围墙里。坚决要求县知事周瀛干出来跟我们答话。毛主席吹一声口哨，我们就高喊一声口号，连吹连喊，大家情绪更加高涨。口号象滚滚惊雷，响彻长空，吓得县衙官吏们，个个面如土色。当时报纸上写道：“工人口号一声喊，长沙县署的瓦起飞。”

这时候周瀛干躲在里面不敢出来，毛主席即派了任树德等八个代表进去跟他辩理。周瀛干这家伙开始态度很强硬，妄图搬出已垮台的省长张敬尧的法律来压制工人，我们代表几句话就驳得他无言回答。可是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又以“各公团商绅不同意调整工价，本知事也不便增减”为借口来搪塞，毛主席就又派了八个代表进去，周瀛干见势不妙，转身就溜跑了，外面的工人，看到第二批代表进去了很久又无着落，大家实在按捺不住心头怒火。这时毛主席从人群中踏上坪中花台上一声高喊：“工友们，第二批代表又没消息，我们就一齐去找周瀛干讲理！”战斗号令一下，六千泥木工人迎着寒光闪闪的刺刀，齐向伪县衙门拥去。反动派害怕了，忙从伪省长赵恒惕的总司令部请来一连武装，把我们包围起来，毛主席一面安定大家的情绪，一面领着大家高喊：“周瀛干必须立即收回成命！不达目的，不出衙门！”

入夜了，谈判尚无结果，大家虽然又饿又累，但战斗情绪仍很饱满。各行各业的工人兄弟打着灯笼火把给我们擂鼓助阵了。缝纫工人送来了法饼、茶水；理发工人见我们坐在地上过夜，送来了大批稻草；电灯公司等许多单位的工人兄弟送来了点心、香烟。各行各业工人的支援，使我们的斗志

更加高涨。

晚上八点多，赵恒惕只好派了个参谋长前来“调解”，说三天内解决，要大家回去。我们回答的是：“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什么时候出衙门！”就这样横下一条心，坚持到半夜，伪参谋长无可奈何了，只好打电话请示政务厅长吴景鸿。答应次日下午二时召开公团协商会议，请工人代表到政务厅等候，毛主席见周瀛干的威风垮下去了，省政务厅也作了让步，同时工人群众也熬了一天一晚，便建议大家暂时回去休息，明天继续战斗。

面斥吴景鸿

次日上午十时，全体泥木工人按照毛主席的部署按时在教育会坪集合了。这是斗争最紧张的阶段，也是最关键的一仗。毛主席亲自担任我们的代表。穿着一套工人服，手里拿着一本“省宪法”，领着代表们到达伪省长公署，在政务厅客厅里等着，三个小时过去了，公团会议仍没有结果。毛主席即向他们提出声明：“如果再没有结果，全体工人就要到省长公署来请愿。”

吴景鸿着慌了，只得连忙出来对代表们解释说：“因为你们要涨价，所以 they 要慎重考虑。”

“请问他们增加房租，提高煤米价钱，也经过我们劳苦大众慎重考虑过吗？”任树德这句话，把吴景鸿问住了。他只好说：“你们应该听从官厅的指令。”

毛主席连忙回答道：“既然涨价都要听从官厅，那么请问商家涨价难道是受了官厅的怂恿？”

这几句话象一把匕首，狠狠地刺了吴景鸿一下，他两眼望着毛主席，好不自在，停了好久，才从鼻子里哼出了一声：“你，你……这是什么话，嗯？”

“这是根据厅长刚才自己的话说的。”毛主席又继续将他一军。

吴景鸿恼羞成怒地说：“你们这是非法行为，有意跟官厅为难。”

“不，我们完全依法办事。”毛主席不慌不忙翻开手中的“省宪法”理直气壮地说：“‘省宪法’第十六条明文规定：‘人民对于政府有上书请愿及请求救恤之权’，如今物价上涨，生活困难，我们提出调整工价，长沙县署偏偏不准，所以到官厅请愿，这犯了什么法呢？请问贵厅长先生。”吴景鸿弄得哑口无言。但这老狐狸惊魂稍定，又使出花招：“先生贵姓？是不是工人？”

毛主席立即回答：“要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

吴景鸿这一反扑，满以为能把对方制服住，谁知又被毛主席几句话顶了回去。

吴景鸿辩不过，不得不承认我们有“营业和工作的自由，调整工价政府不得过问”。

泥木工会当即写了个呈文，给省长公署批准。可是吴景鸿这个狡猾的老狐狸，又在批词中写上“其工价尤应随时协定，不能由工人等一方面加以限制”。妄图继续剥夺工人的权利。毛主席当即指出：“此句万不可存。”责令吴景鸿将它删掉。吴又以“批文需交省长过目签字生效”而进行拖延。对于敌人的种种花招，毛主席早有预计，于是连夜通知